基层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 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实践 ——以浙江省三门县公安局为例

■ 陈 希 黎朝日

摘 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是贯穿侦、诉、辩、审各环节的系统工程。三门县公安局立足基层公安实际，从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的现实意义出发，积极探索在侦查阶段推进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具象化。通过固化具象化流程、完善评估机制、建立保证金提存制度、完善释法说理机制等举措，增强公安机关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积极性，从而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用有效发挥，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从特殊预防向一般预防有效延伸，实现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关键词 侦查阶段 “认罪认罚” 特殊预防 一般预防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写入法律并正式施行。2019年10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适用中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了回应。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题中之义。它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等各个诉讼环节，涉及公安、检察、法院、

司法等多个部门。三门县公安局联合检法部门大胆实践，出台系列规定，在侦查阶段通过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即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危害后果以及社会关系修复等方面进行具体化考量，以达到补充证据，提高办案实效，实现特殊预防向一般预防有效延伸，促进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一、基层公安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陈 希，浙江省三门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黎朝日，浙江省三门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

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是贯穿侦、诉、辩、审各环节的系统工程。2022年《新时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发展回望》指出,“从适用率看,2020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远超85%,从办案质效看,2021年适用该制度的案件一审服判率96.5%。如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成为刑事诉讼新常态,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正在经历深刻转型。”目前,基层公安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价值和司法功效正在充分彰显和发挥,但也呈现出一些问题和难点,主要表现为:

(一) 公安机关适用认罪认罚形式大于实质

《指导意见》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应当同步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工作。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司法机关处罚的,应当记录在案并附卷。”《指导意见》对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多个方面进行了规定,但只要求“记录在案”。在实践中,公安机关的适用存在简单化、机械化、形式化问题,通常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关于认罪认罚的主观态度在讯问笔录中载明并签字确认,或根据其主观态度在认罪认罚记录表上“打钩”记录,并作为其认罪认罚的依据,缺少与定罪时的主客观一致性要求,对其客观方面的悔罪行为未进行过多考量。

(二) 侦查阶段缺乏社会关系修复考量

我国法律规定将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并在社会上服刑、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司法矫正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改造,帮助和服

务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以暴制暴,制造社会对立。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就案办案,对一些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没有及时跟进化解,致使双方当事人关系无法缓和。因此,在短则几个月,长则数年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身心疲惫,可能错过了最佳窗口期,导致被犯法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无法修复。比如,2022年3月犯罪嫌疑人陈某酒后无故滋事,随意殴打路人陈某、王某致二人轻微伤,二人医药费1000多元。案发后,公安办案单位依法对陈某立案侦查并依法移送起诉。在法院判决之后,陈某真心悔过,愿意赔偿受害人医药费损失,但受害人表示已无必要,不接受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三) 侦查机关主动推进认罪认罚动力不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任意阶段都可以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不仅是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也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因此居于主导地位。基层公安侦查部门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取证工作相较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并没有明显区别,实质性工作量没有减少,因此在动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对于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认罚往往停留在被动记录,就办案而办案,而未上升到保护法益、修复社会关系的层面。

(四) 存在“虚假式”认罪认罚

所谓虚假式认罪认罚主要表现为嫌疑人、被告人被迫式、投机式的认罪认罚。实践中,基层公安侦查部门往往会明确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认罚,并需明确表明态度。而部分本可能判决无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对无罪辩护缺乏信心,担心不认罪无法享

受减轻量刑，则会在权衡风险之后被迫选择认罪认罚，这就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另一方面，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真诚认罪认罚，在通过虚假认罪认罚获得轻判后又提出上诉，意图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获取更轻处罚。各地均有认罪认罚后又反悔上诉，检察机关抗诉二审改判的案例。比如，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检察院办理的孙某、彭某非法采矿案，被告人孙某、彭某为获得量刑减轻均认罪认罚，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后因彭某其辩护人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采矿废石没有法律规定需要办理采矿许可证才可采挖，而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法院审理后采纳辩护人意见，判决二人无罪。又如，深圳市光明区检察院办理的李某危险驾驶案，被告人李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在审查起诉期间，李某认罪认罚，对检察机关指控其在公共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事实及证据无异议，一审法院判处李某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李某获得轻判后，反悔并不认部分犯罪事实，心存侥幸提出上诉，检察机关进行抗诉，撤回原认罪认罚从宽处罚量刑建议，最终对李某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虚假式”认罪认罚显然与该制度的初衷相悖，既违背了认罪认罚的基本原则和司法诚信，又浪费司法资源，并产生不良社会效应。

二、基层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的现实意义

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法律层面规定较为笼统，比较抽象。与“抽象化”相对应的是“具象化”，就是把抽象的事物通过

具体事例和行为表现出来。基层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探索认罪认罚“具象化”，就是在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危害后果以及社会关系修复等方面进行具体化考量，由注重其主观态度转化为其主观态度与客观行为共同考量，进而完善该制度的具体运用。

（一）侦查阶段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的正当性

《指导意见》第四条：“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依法推进从宽落实。”第五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第七部分专门对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职责进行了规定，明确侦查机关具有权利告知和听取意见、认罪教育、起诉意见、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职责。《指导意见》还明确：“公安机关应当积极促进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公安机关可以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向被害方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谅解……公安机关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客观行为的考量符合案件侦办要求，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和基础。

（二）侦查阶段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的必要性

一方面，认罪认罚的本质在于自愿。“认罪”在侦查阶段表现为表示愿意接受处罚。犯罪嫌疑人是否真诚悔罪应当结合配合办案及积极消除社会不良影响、挽回受害人损失，修复社会关系等表现来考查。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要从主观上自愿认罪与其客观行为方面积极悔罪表现来综合考量，才能使其的自愿性得到充分的、自由的意志表

达。另一方面，真实性是认罪认罚的灵魂，缺乏真实性而仅有自愿性和合法性的认罪认罚毫无意义。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体系，是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是以证据为中心，对于刑事案件中的证据规则，我国一直明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应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犯罪事实的认定需要证据确实、充分，坚持主客观相统一”，而对于真实性的保障机制却并不完善，不论是审前还是审判阶段，针对认罪认罚真实性的调查方式通常是采用阅卷和询问，主要以口头供认、签属的“具结书”以及在法庭上的自认来做为其认罪认罚的依据。推进认罪认罚的“具象化”，将对认罪认罚口供起到证据补强的作用，从而使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得到有效保障。

三、三门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三门县公安局认真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由“案结”到“事了”到“人和”的理念变革，通过采取固化流程、完善评估机制、建立保证金提存制度等措施。在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办案民警通过告知认罪认罚的相关从轻规定，引导其积极配合止损挽损。同时修复社会受损法益关系，将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主观表示予以记录，与其客观行为表现结合认定是否有认罪认罚情节，是否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建议，积

极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实践探索，不断增进执法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自2023年3月份适用以来，认罪认罚率由90%提高至97%，嫌疑人赔偿损失率从15%上升至40%，实现认罪认罚后零翻供。

（一）公检法出台机制，固化认罪认罚具象化流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指导意见》《浙江省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今年6月三门县公安局与检察院、法院联合制定出台《办理刑事案件适用宽严相济具象化实施细则》，明确办理刑事案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区分案件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性，确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要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应负刑事责任和人身危险性，结合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准确判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种类。在日常侦查办案时，全过程开展普法教育工作，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努力消除其人身危险性，并及时全面掌握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情况，收集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悔罪相关行为证据，如实记录在笔录或单独成卷。对嫌疑人的认罪认罚根据其行为的具象化进行认定，通过主客观方面的综合考量及日常行为表现，形成《犯罪嫌疑人具象化表现记录》，在嫌疑人被起诉时，将材料一并移送县人民检察院，高效推动全县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完善评估机制确保认罪认罚的认定客观公正

在侦查阶段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的过程中出台的《三门县公安局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具象化”评价机制》，从人身危险性、危害后果以及社会关系修复三个方面对认罪认罚的认定进行具象化考量。一是人身危险性评估机制。人身危险性是用来评价犯罪人实施犯罪和再次实施犯罪可能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性格特征、认知心理、对社会发展态度、日常人际关系、有无前科、是否累犯、犯罪前后表现、能否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是否有悔罪表现等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综合测评，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条件。二是危害后果评估机制。对危害后果的认定包括事实性危害和影响性危害两方面。事实性危害是指犯罪主体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客观损害，例如致人死亡、公私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等。影响性危害也指除犯罪主体导致的客观损失以外，给社会造成其他不利后果的客观事实。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性及其大小作为处罚轻重的标准之一，还应与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协调。三是社会关系修复程度评估机制。在遵循合法合理、诚实守信、自愿平等、因案制宜、补罚相适应原则的前提下，对满足适用条件对象的社会关系采取不同方式的修复。涉及矛盾纠纷的，要平衡当事双方的利益，更要修复双方的感情；涉及人身财产损害的，主要采取赔礼道歉、经济赔偿、恢复原样和返还财产；当社会公共资源遭到破坏时，主要采取补植林木、放养、净化河道等修复措施。

（三）建立保证金提存制度破解轻微刑案处理难题

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门县公安局在推进认罪认罚

“具象化”实践探索中，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坚持依法办案与化解矛盾并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原则，对因婚恋、家庭、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民间矛盾纠纷或偶发事件引发的轻伤害案件，积极探索建立《三门县公安局轻微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具体是指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赔偿意愿且有赔偿能力，但因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或因双方矛盾激化等原因而致未能达成和解协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表明赔偿意愿并自愿将赔偿保证金缴存在相关部门的专门账户后，结合具体案情可对其作出从轻或从宽处罚的办案制度。同时，明确规定可适用轻微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制度的案件和适用条件，对赔偿保证金数额，由办案单位根据被害人实际花费或者损失的数额，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参照该类案件民事赔偿标准计算确定。保证金数额应当高于依法应予赔偿费用，但超过部分不得高于依法应予赔偿费用的 30%，犯罪嫌疑人自愿超过标准缴纳的除外。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能很好地防止“狮子大开口”，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履行赔偿责任，保障被害方权益，促成刑事和解、化解社会矛盾。

（四）完善释法说理机制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进一步增强释法说理，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三门县公安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释法说理工作机制，以公正、明晰的论证帮助当事人正确理解和接受法律后果，获得内心认同，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在依法侦办案件过程中，办案民警坚持将释法说理贯穿办案全过程、贯穿认罪

认罪始终，结合罪名、法定量刑幅度、量刑情节，及时向犯罪嫌疑人解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其相关权利义务时，更加注重释法说理功能，通过边办案边说法，让犯罪嫌疑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为什么违法，触犯了哪条法律，为什么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背后的法理，减少犯罪嫌疑人心中的抵抗情绪，更好促进其自愿认罪认罚，并通过本身的经历教育身边人。比如，三门县海润派出所办理的陈某华（16周岁）盗窃案件，陈某华因父母不给他零花钱，便偷偷潜入邻居陈某家盗窃现金500元被刑事立案。陈某华到案后不解，称其朋友盗窃他人车内物品价值2000多元，也仅被行政处罚，而其仅盗窃500元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为此，办案民警对其释法说理，告知其入户盗窃等相关盗窃罪的追诉标准，使得陈某华对自身的行为和法律规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陈某华自愿赔偿了受害人损失，并表示会教育告诫身边人。

四、基层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的启示

在侦查阶段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是为了符合制度设立的初衷和运行的底层逻辑。三门县公安局通过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的实践探索，为基层公安机关全面贯彻落实“认罪认罚”制度提供以下几方面启示。

（一）完善立法，为侦查阶段推进“认罪认罚”具象化提供充分法律依据

《指导意见》对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多个方面进行了规定，但还是停留在“记录在案”层面，并未形成一项程序化的制度。推动制度的真正落地才能更好发挥其在及时有效惩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节约侦查资源方面的价值，但仍需进一步完善立法，将其作为

一个单独程序来建设，以规范侦查阶段认罪认罚流程。如将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制度规范到诉讼程序中，对侦查阶段认罪认罚权利义务告知、教育引导流程以及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意向评估认定等进行规范；制定严格、科学、合法的阶梯式量刑制度，将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不同从宽幅度进行明确，原则上侦查阶段的从宽幅度最大，做到量刑建议提前化、从宽幅度可视化。

（二）增强公安机关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积极性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起点，也是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重要阶段。在侦查阶段施行“认罪认罚”具象化，本质上是提高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视程度，既能及时获得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最终获得关键性证据，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案件侦查效率，节省侦查资源，又能高效衔接起诉和审判程序，还能对案件起到“起点分流”的效果，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同时还能达到激发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促使其尽早回归社会的效果。

（三）强化教育引导促进社会关系尽早修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具体体现，通过敦促被追诉人与办案机关合作，以自愿认罪认罚获得国家一定程度上的宽恕和被害人的谅解，使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由消极主体转变为积极主体，其量刑的幅度与认罪情况、赔偿情况及被害人谅解情况等直接挂钩，从而达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目的。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认罪认罚”具象化，大力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引导工作，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认定中注重考量其是否具有积极的悔罪表现，如及时、足额退

赃或赔偿受害方损失并获取谅解,或通过现身说法启迪和警醒他人等,通过对社会危险性的评估,在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对其予以从宽,有助于引导其弃恶向善,强化教育、转化和挽救效果,有利于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地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深入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 从特殊预防延伸到一般预防

“认罪认罚”具象化有助于刑事司法预防犯罪功能的有效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是指刑罚对犯罪人适用而可能产生的积极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剥夺或限制再犯能力功能、个别威慑功能、个别教育功能、改造功能;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是指刑罚对社会上一般人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潜在犯罪人的警戒和威慑作用,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安抚作用和对一般守法者的肯定作用。公安机关施行“认罪认罚”具象化,促进犯罪嫌疑人真诚悔过、积极改过,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减少其再犯罪的可能性及增加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可能性;通过对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的从宽处理激励其他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又通过犯罪嫌疑人的现身说法,启迪和警醒他人,从案件中吸取教训,达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五) 促进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树立正确法治理念,把打击犯罪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执法目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公安机关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认罪认罚”具象化,除了适用于案件侦办过程外,还适用于看守管教过程。《关于规范开展看

守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表现纳入量刑情节工作的通知》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表现纳入量刑情节,是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的重要举措。只有实施“管化教+反哺社会治理与协同打击”,坚持管化教并重,以管促化,以化带教,以教促管,才能促进羁押人员行为规范引导其尽早回归社会。同时通过“管化教”发挥看守所违法犯罪“情报资料库”作用,提升公安打击能力,促进监室内、外矛盾纠纷化解,发现社会面风险隐患,及时反馈、流转并反哺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和看守管教过程中施行“认罪认罚”具象化,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执法办案要坚持法、理、情相结合”的实然性落实。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侦诉审全过程,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起点,在此阶段适用该制度具有重要价值。三门县公安机关的举措是积极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充分发挥公安职能作用的实践探索,无论是对侦查观念和执法理念的良性转变,还是惩治和预防犯罪、提高侦查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此项工作实施不久,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在没有“量刑建议权”下,如何取得犯罪嫌疑人“信任”,是否利用职权跟犯罪嫌疑人“交易”,还有待实践验证,也更需要公检法三部门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协同推进。

参考文献:

- [1] 史兆琨. 风生水起逐浪高——新时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发展回望[J]. 高检网. 2022. 9
- [2] 朱孝清.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J]. 检察日报. 2019. 5
- [3] 陈学勇. 尊重认罪认罚量刑协商 坚持以审判为中心[N]. 人民法院报. 2021. 7
- [4] 黄伯青、陆越. 从“完善”一词看认罪认罚从宽的前世今生[N]. 人民法院报. 2022. 6

责任编辑 韩笑尘